

我独尊的文化一元论,崇尚多元并存、百花齐放,这对于我们当前各种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思潮、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一元论以及西方的强权政治等弊端具有解毒之用。

如果说以上还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谈论道教文化对于现代生活所具有的有益启示和引导作用外,那么在《道教文化与世界和平》、《道教生育观考论》、《道教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再论道教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等论文中,卿先生则是具体而微地为我们展示了道教文化在上述与人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上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比如在《道教生育观考论》一文中,详细地探讨了道教文化对于人类生育所具有的现世价值,其在文中认为,“道教行房有度的节育主张主要有两点内容,即不可早婚与不可早育”。道教文化此种生育观除了注重节育外,还特别注重优生优育,既重生也重育。比如讲究嗣续有方、妊娠有忌、育儿有法等等。

除了着重阐述道教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现实价值外,卿先生还在其不同的论文当中为我们展示了道教文化在现代语境中探索的不同理路。比如在“道教地方史”的研究上,其《道教在巴蜀初探》、《瓦屋山道教文化考察刍议》、《关于峨眉山佛道兴衰的历史演变刍议》等文就对道教在一些地域当中的发展做出了详细地考论;在“道教人物及其思想研究”方面,则有《试论葛洪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司马承祯的生平及其修道思想》、《张伯端的生平及其〈悟真篇〉的基本思想》等文,其中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来论述葛洪的思想,这种视角是十分新颖的,其研究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去学习的;而在“道派研究”方面,主要有《神霄派初探》、《天心正法派初探》等等;最后,在“道教与封建统治者的关系研究”上,作者也以宋高宗与道教、宋孝宗为个案,深入剖析了道教与上层统治者之间互动关系,为学术界探索道教与政治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总而言之,《道教文化与现代生活研究》一书为我们展现了卿希泰先生最近十年来的治学当中的所思、所为和所得,书中对道教文化所具有的现实生活价值的揭示,以及对于道教文化研究不同理路的探讨,都给予我们很大的启迪,值得我辈学习。

(盖建民,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教授;朱展炎,厦门大学哲学博士、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后。)

西安穆斯林的民俗流变与特色 ——对《西安回族民俗文化》的品读与思考

韩志斌

我国学者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已有悠远的历史。就其宏观研究而言,国内已有相关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但在诸多学者殚精竭虑的研究中,许多成果大都集中在伊斯兰精英上层文化,也就是对《古兰经》法典的精心诠释,对伊斯兰宏大历史的反复考证,或者是对穆斯林精英人物及其思想进行精致探究。周燮藩先生言:“尽管宗教文化热还会促使一些学者继续从事伊斯兰文化研究,但泛泛的研究恐

怕不会满足各方面的需求，专题研究还须待以时日。”^①西安穆斯林学者马健君先生的《西安回族民俗文化》^②的问世则是研究西安穆斯林中下层文化的专题研究与填补空白之作。概而言之，该书在以下层面颇有特色。

一是将西安穆斯林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独特。西安穆斯林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从世界穆斯林的宏大背景来考察，西安穆斯林具有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往的痕迹，这是世界其他地区穆斯林所不具有的地缘性特色；二是从中国穆斯林的整体视野来探讨，西安古都上承秦汉隋唐等历史文化资源，这种深厚积淀的历史底蕴是西安穆斯林独有的地域性优势。将西安穆斯林民俗纳入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从中国穆斯林历史的宏大叙述透视西安穆斯林的历史根源，不但有助于廓清西安穆斯林在中国的历史契机与文化关联，而且能使我们更好的把握西安穆斯林的历史演变及其文化特点。该书透过西安穆斯林民俗文化深入剖析其背后不同文明之间和同一文明之内的诸多交往关系。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民族文化结构中处于基础而重要地位，而西安穆斯林民俗则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新民族文化。从学科发展史角度来看，西安穆斯林文化正是民族学与宗教学之间衍生的“边义文化”，是文明交往的一种学科交叉体现。

二是首次梳理了西安穆斯林的历史来源与流变轨迹，提出一些自得之见。作者认为西安及其附近是伊斯兰教进入的最早地区，也是中国回族形成最早的地区之一，这与古都西安作为交通要冲、战略要地、丝绸之路起点的地缘魅力有关。综合作者及前人观点，西安穆斯林来源可归纳为四点：一是汉唐以来，西亚、中亚各国的外交使节、商人、传教士、留学生；二是约在7世纪80年代，一批受伍麦叶王朝政治迫害的什叶派穆斯林，他们来到中国北方作贸易经纪人，俗称“牙客”。三是安史之乱期间，来唐朝镇压叛乱的阿拉伯帝国军人。他们在唐朝皇帝允许的情况下，居留长安。四是唐代来长安“昭武九姓”的胡人，“昭武九姓”是古代属于中亚的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九个小国家。西安近郊的一些地名及姓氏均留有以上历史遗痕。作者对西安回族的形成时间进行深入考究，认为西安穆斯林是宋代西夏时期来长安的穆斯林与唐代留居的穆斯林后裔交往融合的结果，形成时间是北宋晚期至南宋初。居住区域是西安城内西北角，即仅西安回坊范围。现在的回族聚居区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废都长安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西安回族先民早在五代十国末北宋初期来到这里集中居住，形成回族聚居群体。

三是阐述了西安穆斯林经济生活民俗的各种形态。西安穆斯林物质生产方面的民俗主要集中在农业、养殖业、手工业和商业等传统行业方面。作者指出两点：一是清代同治元年，即陕西回民起义爆发之前是西安回族物质生产活动的分水岭。在此前与后，西安回族的物质生产状况是截然不同的；二是西安城内与城外穆斯林物质生产状况的差异。物质生活民俗包括居住、服饰、饮食等层面的民俗，是西安穆斯林传统观念的外化。它不仅可以增强民族成员之间的身份认同与共识性，而且还可以强化其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和政治观念。作者还对西安穆斯林物质生活民俗的实物形态进行了引人入胜的细节描写，如西安名吃牛羊肉泡馍的工艺流程、文化内涵及其对西安穆斯林的时代意义。作者对西安穆斯林的衣食住行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其文化表现出独特性与普遍性、集体性与类型性。

^① 周燮藩：《伊斯兰教研究四十年》，《宗教研究四十年》，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89-90页。

^② 见马健君：《西安回族民俗文化》，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全书共分五章，共20多万字。

四是由于西安穆斯林民俗文化的文本资料十分缺乏,许多鲜明典型的一手资料是作者在穆斯林民众中调研实践得到的。与众多研究著作泛泛而谈不同的是,作者选取了姓氏与家庭、亲族与称谓、礼仪丧葬为研究个案,探讨了民俗规范与伦理道德在西安穆斯林文化中的历史地位。作者认为西安穆斯林的得姓、取姓方式有其鲜明的民族特点。唐宋时期的回族先民入关时,一般仍保留着原来民族的姓氏,但随着对外交往的扩大,他们的姓氏开始变化。对内交往则用原有姓氏,对外则采用汉姓或汉名。元代以后,西安穆斯林汉化趋势明显。作者指出西安穆斯林得姓方式有五种方式:一是由译音而形成的汉字,如穆罕默德因其在中国的不同音译,而成为不同姓氏,如马、敏。二是以国名为姓,如西安回族中的安、米等姓氏则来自古代中亚古国。三是以民族、地名为姓,如回、锁、羊。四是自改姓,王、高、韩、杨则是不同原因而改姓得来的。五是民族融合出现的姓,如张、王等姓与汉族融合形成的,铁、朵等姓是与蒙古族融合而成的。家族是西安穆斯林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它是以夫妻关系构成的最小社会生活共同体,西安穆斯林传统上的家族也是某一姓氏为某一家族的独有标志。作者按照世代继承,将家族形式划分为五种:即夫妇一代家族、双亲子女两代家族、祖孙三代家族、四世同堂家族、五世同堂家族。西安回族中以第三、四种类型较为普遍。作者通过在陕西关中地区亲自调研,走访穆斯林学者、民众,获得了穆斯林婚姻习俗的典型资料。书中重点描述了西安穆斯林婚姻中的礼仪和民俗活动,揭示了西安穆斯林民俗文化的社会实物文化形态。

五是对西安清真寺文化进行了挖掘。西安现有清真寺 20 余座。西安回族的寺坊组织在清真寺文化很具特色,寺坊是以清真寺为中心在城市聚合临近街巷,在乡村聚合周围自然结成的地缘性回族穆斯林的宗教组织。作者认为西安回族寺坊组织构成有如下特点:一是以居住街巷为基本社会单元,以一座清真寺为中心开展宗教活动和社会生活;二是寺坊具有教务管理和寺务管理的双重组织管理模式;三是寺坊都是独立的单元,互不隶属。作者还对西安穆斯林伊斯兰教信仰的历史流变进行了体系化的梳理。西安伊斯兰教的传统教派是格底目,20 世纪 50 年代,格底目一统西安穆斯林的格局被打破,形成格底目、伊赫瓦尼和赛来菲耶三个教派共存的局面,各教派都有自己的宗教礼仪。

《西安回族民俗文化》也不是一部“天衣无缝”的经典之作,无处不在的“现代主义”观点与阐释,限制了本书的深入研究,当然也为后来者留下了可以拓宽的空间。品读全书,可以体会到作者作为穆斯林学者对西安穆斯林同胞的热爱。正如作者所言,研究该命题“一方面可以使本民族人民群众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有一个较全面审视,便于扬长避短,树立民族自信心与激发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还可以使广大汉族人民群众对西安回族多一份了解,熟悉它们的风俗习惯,从而达到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的目的。……这对于谋求西安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①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对西安穆斯林历史进程揭示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文化思想的逻辑论证,更是从作者以宏观的历史眼光和广阔的文化视野为基础,对包括西安穆斯林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理论结构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总之,《西安回族民俗文化》是一部研究西安回族民俗文化的开拓性著作,学术资料基础及特征分析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西安穆斯林文化既具有宗教的实践性,又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希望本书为后来者进一步反思和深入研究西安穆斯林留下可能推进的空间和深度。我想这也是本书作者的题中之义。

(作者韩志斌,陕西西安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

^① 马健君著:《西安回族民俗文化》,三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 页。